



大学之道

北京大学的传统

铭记传统 薪火相传
纪念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



大学之道

北京大学的传统

刘军宁 主编

铭记传统 薪火相传

纪念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之道：北京大学的传统 / 刘军宁主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5
ISBN 978-7-201-05953-2

I . 大 … II . 刘 … III . 北京大学 — 纪念文集 IV .
G649.2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5383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4.5 印张

字数：180 千字

定价：25.00 元

序

北大使命再追问

刘军宁

自 1898 年创办京师大学堂已有一百一十个年头了；自 1998 年北大百年第一次大规模讨论北大精神与传统以来，又是十年过去了。那次讨论有个重大收获，就是重新接续了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精神传统。因此，有必要继续发掘北大的传统，再现北大的精神，以求得我们对北大精神、北大使命的真理解。而且，在我看来，发掘北大的自由传统，就是发掘中国的自由传统；重振北大的自由精神，就是重振中国人的自由精神；确立北大的使命，就是确立中国大学的使命。

北大是中国的大学理念和自由精神的发源地和养育地。可以说，北京大学及其所形成的精神传统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北京大学及其早期精神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此后中国的思想状况。可以说，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北大功居其伟。北大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精神的家园。北大对中国精神传统的影响，高于任何一座大学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不论是哈佛、耶鲁之于美利坚，还是牛津、剑桥之于大不列颠。一所大学能在本国的思想进程中起到如此重大作用的，全世界似乎只有北京大学。没有一个大学像北大那样如此奠定了一个古老文明的新精神传统。

北大的精神应该是中国的精神，北大的传统应该是现代中国的精神传

统，北大传统的命运就是现代中国的命运。北大的自由传统是中国人争取自由的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北大传统不仅在北大，而且在每一个北大人身 上，在每一个受北大精神熏陶的中国人身上。北大传统，不仅是属于北大的，而且是属于中国的，不仅是属于过去的，而且是属于现在的。北大的精神性格就是、也应该是未来中国的精神性格。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北大的精神传统。

一百一十岁后的今天，北大向何处去？北大如何重新确立自己的使命与目标？

或曰，北大的目标应该是争创一流，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我以为不然。北大的使命不是争创世界一流，而是应该成为国人的精神基地。对于北大来说，守住自己的精神传统比成为所谓的一流大学重要得多。一个大学的使命是塑造并光大一种自由的精神传统，而不是争创一流。成为一流只能是个副产品，而不是大学意义和使命的全部。大学还是应该以精神为上，应该是社会的思想库，是为追求真理的先知提供优越成长环境的温室。北大尤当如此。

或曰，北大的使命是为社会培养人才，为伟大事业培养接班人。我亦以为不然。如果大学的使命是制造人才，那就把“人”转化为“才”了，活的人变成了没有生命的才。当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或为政治事业培养接班人的时候，教育事业就变成了政治事业的一部分，学校就变成统治机器的一个组件。这样的教育制度不把每个人当作“人”，而是当作“才”，当作国家建设的原料，当作国家机器的螺丝钉。一旦变成“才”的时候，99%的都要被扔掉。若国家只取个人中的“才”那一部分，那么剩下的个人本身就成了废料。不论国家有什么样的需要，国家都不应该把个人当作国家所需的工具或才具。

北大的使命，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目的是要把个人变成自主、自尊的独立个体，而不是为了把个人变成为权力服务的“才”。教育应该培养人格的独立，培养自由的公民、自主的个人，而不是让个人依附于国家。北大不应沦为“南书房行走”的养成所。北大的精神传统应该在朝，北大的学者教授应该在野。而不是相反。

北大的未来,乃至整个中国的教育的未来,相当程度上在于北大所代表的精神传统的复活。“北大精神”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归根结底,就是自由的精神。自由是北大精神的内核,包容是北大的象征。北大曾经是以自由、开放、宽容而闻名于世的。蔡元培校长在其《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就明确地说过:“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蔡元培先生在《教育独立议》、《提议教育经费独立案》等文中强调,“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影响。”因为“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明确表示反对:“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致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他呼吁“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和责任。”北大的使命不是做大一统权力机器上的组件,而是做一个社会的精神公器。

大学当以思想与学术自由为原则。北大应该继续是学术与思想自由的大学、探求真理的大学,应该还给师生研究学术的自由,教学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蔡元培先生主张:教授不仅在研究上而更是在发表其研究之结果上,应有绝对的自由;就是其结果与个人的成见,一般的舆论,或社会的习俗有所抵触,起了冲突,应没有顾及的必要。大学教授,在其职业活动的本身上,因其研究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关系,学校当局在学识上既无能力,在道德上又无权可以干涉。

北大和所有中国大学的未来都取决于权力与教育的关系。从世界各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最好不要“重视”教育,不要主抓重点大学,要让公民自己重视教育,让教育界重视教育,让愿意参与教育的公民重视教育。在今天,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是私立大学。所以,学术要自由,大学要独立,国家就应该放弃它对教育方面的垄断,就要限制国家对教育在某些形式上的参与,限制国家对教育的无节制干预。到目前为止,包括北大在内的高校改革只涉及到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即它只涉及到大学内部怎么样进行优化组

合,怎么样调动一部分教师的潜能,怎么样树立学术规范和公平的教授制度,怎么样发挥教授更大的作用。但是根本的问题则没有被触及。这个问题就是治理大学的权力是从哪来的。像北大传统的奠定者们所主张的那样,教育应该与国家权力相分离,所有大学,不论公立、私立,作为有组织的社团,都独立于国家权力。国家应该允许教育机构自主、自治。学校的管理权应该属于独立的校董事会,即使在公立学校也应如此。

大学是驱动文明的精神力量。大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与道德高地,如果不是,那就是大学的失职。如果北大不是,那就是北大的失职。大学应当是一个社会思想成就的顶峰,北大应该是中国的思想成就的顶峰。这样的大学才是称职的大学,值得尊敬的大学。大学是知识、智慧与文化的制造者与传播者。否则,象牙塔就坍塌了,精神家园就沦陷了。

未来的北大,应该像其早期那样,是中国新思想的策源地,是诞生那些追求真理的先知的地方。北大需要的不是楼堂的高度,而是精神的厚度。没有精神传统的大学,就不是大学,没有自由精神传统的北大,北大就不是北大。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北京大学所孕育、传播的自由主义虽然迄今在这块土地上尚未制度化,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北大一直担当着普世价值与自由思想输出者,自由的精神传统的确立者。

期待北大把这个角色演永远演下去!

2008年早春

于翠湖

目 录

序：北大使命再追问 / 1

严 复：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 / 1

严 复：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 / 5

梁启超：自由平等真解 / 8

梁启超：思想解放 / 11

梁启超：论权利思想 / 14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 23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 27

蔡元培：北京大学校旗图说 / 30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 / 33

蔡元培：教育独立议 / 39

蔡元培：关于不合作的宣言 / 42

蔡元培：民治起点 / 46

- 蔡元培 胡适：我们的政治主张 / 49
胡 适：自由主义 / 54
胡 适：人权与约法 / 61
胡 适：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 / 68
胡 适：民权的保障 / 73
胡 适：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 / 78
胡 适：建国与专制 / 85
胡 适：再论建国与专制 / 90
胡 适：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政治信仰 / 96
胡 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 101
胡 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 / 107
胡 适：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 / 112
胡 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 / 116
胡 适：再论无为的政治 / 123
胡 适：五四运动纪念 / 130
- 陈独秀：为自由而战——在武昌艺专演讲 / 138
陈独秀：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 141
陈独秀：法律与言论自由 / 144
- 李大钊：自由与秩序 / 146
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 148
- 马相伯：信教自由（1） / 152
马相伯：信教自由（2） / 157

| |
|-----------------------|
| 蒋梦麟：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 / 158 |
| 蒋梦麟：个人之价值与教育之关系 / 161 |
| 蒋梦麟：进化社会的人格教育 / 165 |
| 蒋梦麟：和平与教育 / 167 |
| 蒋梦麟：北大之精神 / 172 |
|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 / 174 |
| 傅斯年：“五四”偶谈 / 179 |
| 周作人：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 / 183 |
| 周作人：思想压迫的黎明 / 184 |
| 周作人：人的文学 / 186 |
| 周作人：北大的支路 / 195 |
| 张君劢：人权为宪政之基本 / 198 |
| 附：文献出处 / 212 |

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

□严 复

按：严复（1853~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人，特赐文科进士出身，近代最先“睁眼看世界”的几个人之一，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的第一代布道人。对思想家、翻译家的严复，人们毫不陌生；但是作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的严复，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若是没有严复对北大的倾力维护，北大则很可能早已成为国人的历史记忆。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下令严复署理京师大学堂总监督。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呈报临时大总统，提议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大学堂总监督改称大学校校长，并请大总统任命原总监督兼文科学长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长，当天经袁世凯批准并发布临时大总统令正式任命。与除了钱什么都缺的时代不同，那时的北大，除了钱，什么都不缺。当时的教育部，因为缺钱，甚至一再要求严复“停办北京大学”。下面这份说贴铿锵有力，义正词严，把教育部对北大的责难逐条一一驳回。此文其中，“中国不可一日无北京大学”一时传为美谈。严复为挽救北大历尽艰辛，不仅多方筹款，而且自己带头降薪，才保住了北大。没有严复，就没有后来的北大。此事不仅关系到北大的存亡绝续，而且对中国近现代文化、教育、科学以及思想的发展也具有重大影响。

北京大学创建十有余年，为全国最高教育机关，未尝一日停辍。去年武汉事起^①，学生相率散归。代谢之后，国用愈细，几至不名一钱。此校仅图看守，亦且费无从出。前总监督劳乃宣谢病而去^②。本校[长]受任于危难之际，承袁大总统谆切相托^③，义难固辞，勉强接事。时与学部度支两首领再四磋商^④，商请用款，迄无以应。不得已乃陈明总统，由华俄银行暂借银数万两^⑤，横柱目前，重行开学。此本校长接办以来之大概情形也。比者颇闻斯校有停办之议，本校长始亦赞同其说，而详审事实，有未可者。请为大部（尔见）缕言之。

查北京大学考其程度教法，欲与欧美各国大学相提并论，固不可同年而语，然在建置之初，固亦极当时之人材物力，竭蹶经营，以勉企其所蕲向之鹄的。又积十余年之因仍迁嬗，糜财耗时，而后有今日之地位，为全国中比较差高之学校。今若将其废弃，是举十余年来国家全力所惨淡经营，一旦轻心掉之。前此所糜百十万努金，悉同虚掷。且北京为革命后地方完全未经破坏之区，前日大学形式依然存在。学生在校肄习，历年岁年，纵不能更照旧章予以出身奖励，将持何理由而一切荟萃采之乎？此则停办大学之未可一也。

夫各国之有大学，亦无法定之程度。取甲国之大学与乙国之大学相比观之，不能一致也。取某国内甲地之大学与乙地之大学相比观之，亦不能一致也。此固有种种之原因、种种之历史，从未有一预定之程度，必至是而始得为大学，不至是而遂不得为大学者也。且程度亦何常之有，吾欲高之，终有自高之一日，若放任而不为之所，则永无能高之时，此则停办之说之未可二也。

且吾国今日应有大学否乎？往者初立大学之时，言教育者即多议，以为吾国教育方针，必从普通入手，今中小学未备，而先立大学，无基为墉，鲜不覆

① 武汉事起——指 1911 年（辛亥年）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

② 劳乃宣——浙江桐乡人。1910 年（清宣统二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学部副大臣及代理大臣。

③ 袁大总统——指 1912 年取代孙中山、担任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

④ 学部——清末管理全国教育事务的官署。度支——清末掌管全国财政的官署。

⑤ 华俄银行——指 19 世纪末俄国与法国联合在中国开办的华俄道胜银行。



若没有严复对北大的倾力维护，北大可能
早已成为历史记忆。

溃。则不知高等大学与普通教育双方并进，本不相妨。普通教育所以养公民之常识，高等大学所以养专门之人才。无公民则宪法难以推行，无专门则庶功无由克举。今世界文明诸国，著名大学多者数十，少者十数。吾国乃一已成立之大学尚且不克保存，岂不稍过？且北京者，民国之首都也。天津西沽大学又有历年，其学科阶级，夙在高等学校之上。江浙各省及湖北武昌，亦方议建立大学，北京既称国都，反出行省之下，本末倒置，贻消外人，此则停办大学之未可三也。

且国家建立大学，其宗旨与中小高等各学校不同。中小高等皆造就学生之地，大学固以造就专门矣，而宗旨兼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各国大学如希腊、拉丁、印度之文学哲学，此外尚有多科，皆以为文明国家所不可少，设之学官，立之讲座，给予优薪，以待有志。有来学者，得其师资，即使无人而各科目为研究，探（绩）索隐，教思无穷，凡所以自重其国教化之价值也（日本有森泰来者，为全国中能诗之第一手，而其大学即延之以为诗学讲师。夫日本之于汉文，早已视同刍狗，于诗学乎何有？此其专为目前效用计哉。亦所以备具大学之科目，而自隆其国家之声价也。其余如吾国小学、经学

及阳明心学、佛教梵文等，无不加以特别之研究。彼固醉心欧化，而其保全中国旧学若此。今日革新方亟，旧学既处于劣败之地，势难取途人而加以强（耳舌），顾于首都大学，似不妨略备各重要主科，以示保存之意。全国之大，必有好方敏求之士，从而为之者。即使向往无人，亦宜留此一线不绝之传，以符各国大学设科之急。至于科目，亦宜详加甄采，以备仿循，不独为造就目前学生计也）。如此则学生之人数多寡有无，皆不足以沮进行之计画。况既为全国比较差高之学校，当亦有比较相当之学生，既有造就之盛心，必不患无学者。此次开学，蒙总长途校，有设立研究会之政见，但若依前说办理，则功效当复相同，是则为吾国保存新旧诸学起见，停亦之议之未可四也。

至于养校之经费，则窃以谓今之大学，固当先问其宜存与否，存矣，则当问其进行之计画为如何，不得以筹费之难易为解决也。如费之难易为解决，则今日财政窘迫现象何如，国家必一事不兴而后可。不为积极之经营，而徒为消极之计算，虽举国之生灵，咸令槁饿，其于国家大计，所补几何？假必为建设之事，则国家肇建万端，所需经费何限，区区一校所待以存立者，翘九牛之一毛？其所保持者甚大，所规划者至远，如此，夫何惜一年二十余万金之资，而必云停废乎？”此则不佞所大惑不解者也。至于斯校以前办理之未尽合法，固为学界所共知，但今所急宜提议者，在于存废问题。如其必废，则何所复言；如尚可存，则种种改良手续，方自今始，岂得因循苟率，而以偷惰为安？但本校重开在大乱停阁之后，加以暑假期迫，生徒未尽来归，故虽稍稍布置，只能粗立纲领，终未确定规模。以议者纷纭，既有结束种种问题，自不得不先详存废理由，以凭核断。大部如以鄙见为不然，则方来之事，请待高贤。若以为犹有可从，则改革之谋，请继今以进。谨议。

1912年，（抄件现藏北大档案馆）

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

□严 复

按:在这份呈给教育部的说贴中,作者详细阐明创办新式北京大学的指导思想与改革措施,提出“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的办学思想,要使北京大学成为“一国学业之中心点”。北大的自由主义精神传统从此奠定。

在作者看来,大学堂是培养治学之材的地方,在中国不办大学堂则已,要办就要依据治学与治事分开的原则。因为“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惟有或不相侵,故能彼此相助。……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天下未有民权不重而国君能常存者也。”承认治学与治事须分开,就意味大学教育必须独立,既要独立于治事的官衙,也要独立于以政治为职业的政党,从而为后来蔡元培等人提出“教育独立”在理论上铺平了道路。可以说,严几道先生是北大传统的奠定者。

自学校之弊既极,所谓教授训导者,每岁科两试,典名册,计货币而已。师无所为教,弟无所为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积习已久,不可骤更,乃不得已而以书院济之,十八行省中,其布政司之所治者,必有数大书院,若府治,若县治,莫不有之,即村镇之稍大者,亦往往有焉。书院之

大者，岁糜数万金之款，聚生徒数百人；其小者，亦必有名额数十。月必有课，课必第其甲乙。官若师则视其甲乙以奖励之，若师若弟子，均有所事事，而学校之意遂寄于书院矣。木之老也，必荣其枝；事之弊也，必贵其式。有内阁而又有军机，有地方官而又有局所，其同一故哉！然书院之兴，虽较胜于学校，其所课者，仍不离乎八股试帖，或诗赋杂体文；其最高雅者，乃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等而试之。而其不切于当世之务，则与八股试帖等。士之当穷居，则忍饥寒，事古毕。父兄之期之者，曰：得科第而已。妻子之望之者，曰：得科第而已。即己之寤寐之所志者，亦不过曰：得科第而已。应试之具之外，一物不知，无论事物之赜，古今之通，天下所厚望于儒生者，彼不能举其万一。即市侩贩夫，目不知书，而既阅历于世者甚亲，其识或出儒生之上。于是举世不见通儒之用，而儒术遂为天下病。况乎叔世俗漓，机械百出，当其伏处，苟能咿唔，作可解不可解之文字，尚能藏其拙也。一旦通籍，则尽弃其诗书乐礼之空谈，而从事簿书期会之实事，非独其事非所素习也，即其情亦非己所素知。在捷给者，或不难尽更其面目；其迟钝者，仍不免有平夙作诸生时之故态，而因以为仕病。盖章缝之道苦矣。有识之士，深维世变，见夫士气不振，官常不肃，学业不修，政事不举，一一均由于所学之非；乃相与慷慨叹诧而言曰：天下之官，必与学校之学相应，而后以专门之学任专门之事，而治毕举焉，斯言也，一唱而百和，凡为有志，莫不然之。虽然，以此论矫当世之论则可耳，若果见诸施行，则流弊之大，无殊今日。

天下之人，强弱刚柔，千殊万异，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尝有观理极深，虑事极审，宏通渊粹，通贯百物之人，授之以事，未必即胜任而愉快。而彼任事之人，崛起草莱，乘时设施，往往合道，不必皆由于学。使强奈端以带兵，不必能及拿破仑也；使毕士马以治学，未必及达尔文也。惟其或不相侵，故能彼此相助。土蛮之国，其事极简，而其人之治生也，则至繁，不分工也。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今新立学堂，革官制，则必曰，学堂之学，与天下之官相应，则必其治学之材，幸而皆能治事则可，倘或不然，则用之而不效，则将疑其学之非，其甚者，则将谓此学之本无

用，而维新之机碍，天下之事去矣。

然则将何为而后可？曰：学成必予以名位，不如是不足以劝。而名位必分二途：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若有全才，可以兼及；若其否也，任取一途。如谓政治之名位，则有实任之可见，如今日之公卿百执事然，人自能贵而取之；学问之名位，既与仕宦不相涉，谁愿之哉？则治学者不几于无人乎？不知名位之称，本无一定。农工商各业之中，莫不有专门之学。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野无遗贤之说，幸而为空言，如其实焉，则天下大乱。今即任专门之学之人，自由于农、工、商之事，而国家优其体制，谨其保护，则专门之人才既有所归，而民权之意亦寓焉。天下未有民权不重而国君能常存者也。治事之官，不过受其成而已，国家则计其效而尊辱之。如是，则政治之家亦有所凭依，以事逸而名荣，非两得之道哉？且今日学校官制之大弊，实生于可坐言即可起行之一念耳。以坐言起行合为一事，而责以人人能之。方其未仕，仅观其言，即可信其能行；及其不能，则必以伪出之，而上不得已亦以伪应焉，而上下于是乎交困。天下古今，尝有始事之初，不过一念之失，而其末也，则弊大形，极天下之力而不足挽回，此类也哉！

1898年，《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